

# 日本军国主义 对中国东北的思想文化侵略研究

——以吉林省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档案为主要依据

庄严<sup>1</sup> 穆占一<sup>2</sup> 王放<sup>2</sup> 朱巍<sup>2</sup>

(1. 中共吉林省委 宣传部, 吉林 长春 130055; 2. 吉林省档案馆, 吉林 长春 130041)

**摘要:** 文章利用吉林省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档案, 深入研究百年来尤其是东北沦陷时期,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文化侵略和思想控制的手段及其危害性, 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日本灭我文化、亡我中华的累累罪行。文章对于全面、彻底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思想, 批驳日本右翼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言论,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日本; 思想文化侵略; 吉林省档案馆; 侵华档案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4) 08-0020-16

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殖民统治构成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关系最黑暗的一页。在这一过程中, 中华民族饱受摧残和压榨, 生灵涂炭, 民不聊生。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侵略者直接或间接造成 3500 余万中国军民伤亡, 而由此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文化损失更是无法估计。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犯下的不容争议的罪行。经笔者深入研究发现,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和欺凌采取了“文”、“武”两种手段。“武”的手段主要表现为通过发动侵略战争, 利用疯狂的杀戮和掠夺实现对华野蛮占领和统治。“文”的手段主要表现为在近代的百年间, 形成了一整套侵华理论, 通过各种形式对中国进行长时间、大规模的思想控制和文化侵略, 企图泯灭中华精神, 同化华夏文化, 永久占领中国。本文通过深入研究百年来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思想控制的手段及其危害性, 力图以史为鉴, 避免历史重演, 对于全面、彻底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思想,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 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背景和理论形成

日本侵略中国的思想已有长达 400 多年的历史。<sup>①</sup> 从丰臣秀吉时代日本就开始不断地进行对外扩张, 并将一衣带水的中国作为主要侵略目标。一方面, 日本大力发展军事, 谋划侵略战争; 另一方面, 日本国内聚集了大批政治、军事、文化、科技人才, 为侵略战争提供可行性、必要性论述, 谋划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 (14@ZH002)。

作者简介: 庄严, 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吉林省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档案整理研究”负责人, 研究方向: 思想文化研究; 穆占一, 吉林省档案馆副馆长, 研究方向: 文史管理学; 王放, 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 档案管理; 朱巍, 吉林省档案馆编研处副主任科员, 研究方向: 档案管理。

<sup>①</sup> 王向远 《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特征、方式与危害》, 《北京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 期。

侵华手段和战略构想，最终形成了一整套侵华理论。其中许多言论不仅被收录成书，甚至进入日本的国民教育、战争动员、道德评判、社会规范之中，广泛地渗透于日本国民的心理意识、风俗习惯之中。这些侵华理论通过直接宣传或间接暗喻等方式积极为侵华战争服务，并试图美化、合法化日本对华侵略行径。因此可以说，日本近代的侵华行为是立体的、全面的。

### 1. 明治维新前日本精英阶层的侵华企图

“西渡中国，荡平大明”曾是日本民间学者的“百年迷梦”。19世纪初，以“经世家”著称的日本学者佐藤信渊便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详细地构想了一套侵占中国的“秘策”。该书论述了“攻取”中国的方法和步骤，甚至连各省在“攻取”中国时的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也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周密的安排。受佐藤信渊的影响，此后日本民间出现了不少同调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对外侵略的思想主张。<sup>①</sup>日本幕府时期侵华理论代表者吉田松阴提出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sup>②</sup>的大胆构想；1825年，水户儒学人士藤田幽谷也提出“宇内至尊天日嗣，须令万国仰皇朝”<sup>③</sup>的狂妄企图。这些言论构成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思想“原型”。

### 2. 近代日本侵华理论的逐渐系统化

“大举入支那，直捣北京城”的思想使日本民间侵华理论“粉墨登场”。明治维新后，日本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福泽谕吉在其著作《脱亚论》里，宣称日本与西方列强是具有同等“文明程度”的国家，日本有责任也有义务以发动战争的方式“帮助”中国及朝鲜这样还未开化的“野蛮”国家推进“文明”。虽然福泽谕吉一生都只是以民间文人的身份在日本开办学校、编辑报纸、著书立说，但他的思想对日本社会影响深远。从明治维新到现在的安倍政府，福泽谕吉的影子无处不在。日本主流舆论奉福泽谕吉为“日本近现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sup>④</sup>，他的肖像被印在如今日本面额最大的纸币上。在福泽谕吉的侵华文章中，武装、暴力的言论随处可见。就是这样一个野心家，却成为许多日本文人顶礼膜拜的“偶像”，拥护者甚众。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竹越三叉的《支那论》、江藤新平的《支那南北两分论》等作品，不断扩展和充实福泽谕吉的侵华思想理论，详尽地设计了侵华过程，通过报纸刊登发行，对社会舆论、国民思想、政府决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 3. 甲午战争后日本文人对中国历史和国民性的研究

“日本是文明的，中国是丑陋的”这一说法是日本御用文人为军国主义侵华披上的“合法外衣”。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告败，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仅得到了台湾这一战略要地和巨额赔款，而且促进了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进而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尝到了战争赔款的甜头，更加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贪婪侵略扩张的“味蕾”<sup>⑤</sup>。巧合的是，日本对华侵略的步骤与之前日本民间文人学者的设计吻合，这让日本侵华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以日本帝国学士院院士、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为代表的日本文人把研究侵华策略作为附庸追逐的“潮流”和抬高自己社会身份的“捷径”，把侵华思想作为一项课题研究。这些打着学术幌子的“研究”成为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有的“研究成果”甚至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文化侵略的“急先锋”。他们挖空心思从历史中寻找侵华的“合理根据”和可能性，为日本侵华出谋划策，并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披上“羊皮”，使之合法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学术界十分热衷于所谓的“支那国民性研究”<sup>⑥</sup>，原惣兵卫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和加藤虎之亮的《支那的民族性》恣意扭曲和丑化中国人的形象和性格，并声称侵

① 参见周兴旺《日本人凭什么·前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② 转引自韩东育《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1592—1945）》，《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③ 转引自渠长根《论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华政策渐变的思想根源》，《江海学刊》2006年第6期。

④ 张嫦娥《论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0页。

⑤ 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154页。

⑥ 王向远《日本对华侵略与所谓“支那国民性研究”》，《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华是用日本优秀的国民性来改造中国恶劣的国民性，为日本侵华寻找借口和提供对策。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不是一个虚拟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sup>①</sup>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历史比武装侵略的历史更长，日本侵华思想一直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服务，在日本对华侵略中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在全面军事入侵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了达到长期占据中国的目的，将文化侵略作为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实行所谓的“文武之道”，即一面实行赤裸裸的烧杀暴行，一面实施所谓的“怀柔政策”，通过文化渗透和思想控制，对中国进行系统的、有目的的、破坏性的文化侵略。这一点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14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 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思想文化侵略的主要手段

思想文化侵略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东北实行残酷的军事统治、无情的经济掠夺之外的重要侵略手段。吉林省档案馆藏（以下简称“馆藏”）1944年3月18日出版的《满洲评论》第26卷中，有一篇题为《勤奉制度的战时意义与部队运营》的文章，作者寺田隆良在其中赤裸裸地写道“战争虽然是用武力来施行，但是使用武力战摧毁敌人武力的同时，通过思想来制服敌人的思想也很重要。让敌人的思想屈服，封杀敌人的谋略策略，消灭敌性思想、反国家思想是近代战中的一种武力战。”可见，日本在伪满洲国实行的一切思想文化侵略措施，以及七七事变后在占领区采取的一切思想文化侵略手段，都是为伪满洲国最后划归日本，为最终侵吞中国所做的政治、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手段主要有以下9种。

#### 1. 推行“建国精神”，愚弄东北民众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等密谋，于1931年9月22日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以关东军参谋部文件形式发出，明确要建立由日本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土”<sup>②</sup>。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迫不及待地炮制出“建国精神”，并极力推行。馆藏伪满时期资料《报德要记》中将“建国精神”解释为“融合满洲国的精神，满洲国的建国精神和民族协和的理想是分不开的，协和即民族一心一德的融合体”。

日本提出“建国精神”的目的就是在中国东北推行日本的殖民主义。其要点在于：一是极力宣扬满洲“独立”的思想，企图将中国东北从中国的版图上分割出来；二是用日本殖民主义文化对中国东北人民进行同化，即实行所谓的“文治”，或明或暗地宣扬日本文化的优越和先进、中国的野蛮和落后，以此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使之甘愿服从日本文化的“指导”；三是把伪满说成“五族协和”的“独立的新国家”和“王道乐土”。

寺田隆良清楚地表明日本侵略者确立“建国精神”的用心：“在满洲国内，建国精神思想体系的明确，全部国民的思想教化……全部国民的日常生活行为需要和国家的前进方向一致，我们倡导皇道、建国精神以及决战体制的确立的同时，所有的国民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多么小的行为都要与国家精神一致进行行动，不管是自觉的还是无意识的都要这样做。”<sup>③</sup>

1940年后，“建国精神”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除继续宣扬“王道主义”和“民族协和”外，把灌输伪满洲国的“建国元神”作为重点内容。溥仪访日之后，日本在溥仪居住的帝宫建立“建国神庙”，宣扬伪满洲国所谓的“建国元神”——天照大神。1940年7月20日新京宪兵队长近藤新八上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竹内宽一份《关于创建建国神庙的反响以及内查之件的报告“通牒”》，其中

① 王向远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② 敖文蔚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谬论特点剖析》，《日本研究》1993年第2期。

③ 寺田隆良 《勤奉制度的战时意义与部队运营》，载《满洲评论》第26卷，1944年，吉林省档案馆藏。

伪满民生部教育司长田村指出“供奉天照大神的建国神庙的建立理由是八纮一宇、日满一德一心。”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辅导科安藤某认为“建国神庙可以加强日满一德一心的认识和信仰。现在问题就是将来如何使满人大众彻底理解天照大神的精神。”在牡丹江宪兵队上报的文件中，市公署职员认为“建国神庙的建立进一步彰显了满洲建国的宗旨”<sup>①</sup>。

日本关东军利用溥仪，从伪满建国初期发表的《满洲建国宣言》、《满洲国执政宣言》到《国民训》、《国本奠定诏书》等，满纸都充斥着“建国精神”，把“无种族歧视”、“五族协和”、“王道乐土”、“一心一德”等作为伪满洲国的根本理念，不断地向东北民众进行灌输。馆藏1936年7月《满洲儿童的日本人观调查结果统计》报告中提到，1934年3月满铁初等教育研究会根据学务课的指示在学生中进行“日满人的优缺点”调查，这项调查包括国民意识、感情和意志、生活实践三方面内容，一直持续了2年。报告对调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了满洲儿童眼中日本人的10大缺点，即欺负满洲人、大量喝酒、购买无用品、吸食鸦片、虚伪、蔑视外国人、爱说别人坏话、轻薄、浪费、粗暴。调查的目的是“测试满洲儿童如何看待现代在满日本人，探究他们的民族性，成为促进两民族协和的一份资料”，特别“希望本调查能够成为今后继续研究满洲人心境的参考”。这样一份针对儿童开展的调查，其报告结果出现在关东宪兵队保存的档案中，可见日本为了解东北民众的思想，进行思想控制，以达成所谓“五族协和”的目标，任何手段都加以利用。

作为对东北民众进行思想文化控制的“灵魂”，日本侵略者对“建国精神”的宣传、培养始终贯穿在14年侵华史之中。

## 2. 建立思想文化控制体系，严密管控思想舆论

日本侵华战争是非正义、反人类的战争。为了最大程度掩盖这一点，极力防止日军的暴行为世人知晓，日本对其国内和中国沦陷区进行了严格、严密的控制。日伪建立了协和会、弘报处等一系列的思想文化管控机构。

(1) 管控宣传舆论的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1932年，伪满洲国刚刚建立，日本侵略者便设立了思想文化统治机构——资政局弘法处。1933年，资政局被撤销，弘法处的业务划归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新设立的情报处，作为伪满言论文化的中心统治机关，管辖新闻、出版、通讯、广播等事业。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和时局的变化，1937年伪满政府行政改革时，将情报处改为弘报处。弘报处作为伪满言论文化统治中枢，全面统治伪满洲国的舆论宣传，领导和监督新闻机关，管理出版、电影事业，控制广播及通讯机关，管制文艺活动等，成员全部为日本人。1940年11月，弘报处接管了伪民生部、伪交通部、伪治安部、伪外务局的相关业务，成为大弘报处，负责电影发行和报纸出版的审查，广播、新闻、通信的审查，美术、音乐、电影、戏剧等动态的文化行政事务、对外宣传等。1941年8月同时发布了《满洲国通讯社法》、《新闻社法》、《记者法》即所谓的“弘报三法”，对新闻进行全面控制，大力宣扬奴化思想和殖民政策。馆藏1941年弘报处发布的《文艺指导纲要》，确定了旨在加强对文艺工作实行集中统制的方针，其中毫不隐讳地写道“我国艺文乃以建国精神为基础，是为八纮一宇精神之美的显现。”其宗旨是要把“世界最高的日本艺文移到满洲来”。《文艺指导纲要》的颁布标志着伪满文化专制政策进入了新的阶段。

为了严密控制伪满洲国的文化宣传，弘报处将一些特殊会社与文化团体拼凑到一起，如伪满文艺协会、伪满出版协会、伪满广播协会、伪满通讯社、伪满映画（电影）协会、伪满弘报协会、伪满演艺协会等等。通过监督、控制以上组织，弘报处将文化系统的各个行业都纳入其严密控制之下。此外，弘报处还在伪满洲国各地建立了庞大的弘报组织，对日伪当局的思想文化侵略意图进行渗透。馆藏的一份《扶余县弘报组织表》清晰地记载了扶余县伊店村公所的弘报组织情况。该村共有8个屯，每个屯设有若干个牌，从村长到屯长到牌长形成了一张涵盖184人的弘报组织网。馆藏1943年3月

<sup>①</sup> 吉林省档案馆藏315号全宗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

《关东军宣传月报》要旨中记载“二月下旬的报道演习的成果通过各种弘报机关之手渗透到了满洲内部各个社会阶层。”弘报组织的作用可见一斑。

(2) 承担灌输“建国精神”任务的伪满协和会。伪满协和会的前身为原满洲联盟成员山口重次、小野开作等人在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的指挥下组建的协和党。协和党的目的是开展以伪满“建国精神”、“民族协和”为中心的思想宣传，欺骗东北人民，泯灭东北人民反满抗日的思想意识。后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主张下，将“协和党”改为“协和会”。1932年7月25日，协和会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名誉总裁，本庄繁任名誉顾问。到1945年8月17日，伴随着伪满洲国的垮台，伪满协和会自动解散。

伪满协和会是向东北人民灌输“建国精神”的社会团体，由日本关东军直接控制。在日伪的支持、操纵下，伪满协和会建立了十分庞大的组织体系，遍布东北各民族、各阶层、各部门。其基本单位是分会，分会是协和会开展各项活动的主体。据统计，协和会的分会达5000余处，会员达400余万人。<sup>①</sup>除分会外，还成立了许多外围组织，如国防妇人会、军人后援会等。

日本关东军利用协会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行文化侵略政策，这一点通过协和会的创立宗旨和任务暴露无遗。协和会创立宣言提出，协和会的宗旨是“遵守建国精神，以王道为主义，致力民族协和”。协和会的基本任务是“精神灌输”、“精神麻痹”、“精神禁锢”、“精神治理”。对此，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曾明确说“既非政府之从属机关，又非对立机关，乃政府之精神的母体也。”<sup>②</sup>而所谓的“精神母体”即“建国精神”。协和会章程第四条也清楚地写道“本会是以图满洲建国精神作兴与王道政治的宣化为目的。”<sup>③</sup>

除了弘报处、协和会等，日伪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机构还有伪治安部警务司，伪民生部教育司、厚生司，伪司法部民事司、刑事司等。关东军报道班也是从事战争宣传和殖民思想统治、文化控制的机构。另外，关东宪兵队也担负着收集思想文化情报的重要任务。

(3) 负责搜集思想文化情报的关东宪兵队。关东宪兵队在伪满14年期间，一直担负着大肆搜集东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类情报，参与武装占领东北的各项活动，执行治安保卫、监视伪军政要人、搜捕抗日谍报人员等任务。同时，通过两项主要业务，即九一八事变后到伪满灭亡一直坚持的邮政检查业务，1935年以后相对于武装讨伐而言的政治思想镇压活动的思想对策业务，来钳制中国人的思想。这两项业务形成的《通信检阅月报》、《思想对策月报》等成为日本对伪满洲国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重要情报来源。

邮政检查制度，即日军对占领区外籍人士，包括驻伪满各国公使馆人员及所有在华日军和家属的信件、电报、电话进行秘密检查。关东宪兵队及关内各地宪兵队成为邮政检查制度的指挥者和主要实施者。他们采用在邮局设立特别室，秘密拆看信件或监听电话、监打电报等手段，以发现和侦察反日活动或对伪满不利的言论等。各宪兵队每月形成一期《通信检查月报》，上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以各地月报为基础向关东军司令官报告，并在关东宪兵队和各派遣军宪兵队间相互通报。《通信检查月报》的主要内容分为要旨和邮件检查情况，要旨主要介绍本月通过邮检发现的主要问题和处理情况；邮件检查情况主要分类有抗日通信、抗日刊物、可疑通信、对防谍上有害通信、对军纪上有害信件、对国内治安上有害通信、有关民心动向的观察资料等。关东宪兵队实施的邮政检阅，不仅针对中国人，还包括所有生活在东北的外国人，也包括日本人。吉林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个信封，是1931年11月日本东京府的山崎光明寄给伪吉林省公署长官熙洽的信，信封上加盖“长春宪兵队邮检完毕”的戳记。1939年7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中央检阅部《通信检阅月报》记载了哈尔滨

① 孙邦主编《殖民政权》，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3页。

②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5页。

③ 杨家余《伪满社会教育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石井部队正崎为志写给千叶县石原市太郎的信件摘抄，记录了1939年6月石井部队作为特殊秘密部队到前线作战的史实。此信泄露了日军在诺门罕战争期间使用细菌战的情况。馆藏450件邮政检阅档案中涉及45000余封被检查处理信件，其中日本人之间的信件占一半以上。

日本宪兵队进行邮政检查的主要目的，一是防止不适宜扩散的信息泄露出去，如日军的暴行、军事行动；二是了解抗日动向，镇压抗日活动；三是了解民心动向。邮政检查成为各地宪兵队掌握民心动态的渠道之一。从1939年到1940年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各月形成的《通信检阅月报》中可以看出，关东宪兵队在邮政检查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信件、电报的检阅量每月都有几十万封，最高近100万封。1940年各宪兵队在制定完成思想对策工作具体任务的措施时，把加强邮政检查工作列为重要措施之一。

思想对策业务的始作俑者是时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他提出在日满警务机关中设置“思想对策”专门机构，即中央警务联络委员会，委员长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担任。<sup>①</sup>馆藏1935年10月30日中警委第72号东条英机签署的《关于提出思想对策意见通牒》，是有关思想对策方面目前有档案可查的最早的一份文件。

馆藏1935年蒙政部制定的《秋季治安整治工作中的思想对策要纲》中提出的思想对策目标：“通过积极推行满洲国王道政治的普及贯彻工作，使其有所强化，同时通过逮捕、搜索潜入全满特别是城市、铁道、主要交通路、水路等地方的反满抗日地下工作人员、旧东北军相关的策动分子、从国内外而来的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赤化工作人员等，以及企图扰乱满洲国国内的治安的不法分子，消灭思想上、政治上匪势猖獗的根源，以期彻底完成满洲国内的剿匪工作。”为实施这一目标，“对于妨害满洲国王道政治的人和事情的警防要根据关东军的方针，在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统管下，响应日满宪警各机关各职责，潜入各不法工作团的内部，周密了解各不法团的战法、组织等信息”。要纲除强调破坏、逮捕等手段外，也强调“鉴于仅仅依靠传单、布告、活动拍照、讲演会、救恤等方法，不能真正实现王道政治的普及、贯彻，治安相关各机关需要不断地致力于民众启蒙教化，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联系”，“治安维持会通过宣抚委员会实施能够普及、贯彻王道政治的直接的、积极的手段”。

1940年，日本近卫内阁抛出“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妄图建立一个包括中国、朝鲜、东南亚各国及大洋洲在内的日本殖民大帝国。为实现这一野心，日本侵略者四处出击，对战时军需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加紧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导致广大民众的生活日趋恶化，不满情绪日趋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宪兵队随即调整了思想对策业务的重点，把控制民心动向，监视社会舆论，侦察、破坏反满抗日活动的萌芽作为主要业务。1940年5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制定了《思想对策服务要纲》，<sup>②</sup>30日在宪兵队队长会议上下达给关东宪兵队各队。《要纲说明》指出“思想对策是以控制国内民心动向为对象的一项工作。要真正收到实效，就要长期、认真地对民心进行侦察，以明确民心的动向趋势，并实施相应的对策，这样才能把握真实的情况，并且对策很难在一朝一夕内取得实效，客观上思想对策工作应该遵循一定的方针。”为了收集情报，关东宪兵队指示各地宪兵队“有组织地设置永续性的侦谍网”。<sup>③</sup>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思想对策活动，1940年5月关东宪兵队组建了“思想宪兵队”，这是一支“以特务工作为原则的秘密宪兵队”<sup>④</sup>，隶属于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专门用以担当思想统治和思想镇压活动。馆藏《思想宪兵队编成要领》清晰地勾勒出了思想宪兵队的概貌。思想宪兵队的组建方针是加强伪满洲国的思想防卫，制定一元的侦谍网，主要是完备对策以及确立将来战争发生时的思想、谍

① 傅大中《关东宪兵队》，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74页。

② 吉林省档案馆藏315号全宗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

③ 吉林省档案馆藏315号全宗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

④ 吉林省档案馆藏315号全宗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

报、宣传、谋略基础。其任务和权限为专门负责思想对策业务,以及与思想相关的谍报、宣传、谋略、防卫形态的确立。服务地域为关东宪兵队管辖区域,必要时,得到军司令官许可,可常驻国外或者临时派遣。

思想宪兵队的经费预算为每年20万元,定员约150名,宪补、宪兵补约200名,共计约350名;每名宪兵配给2名密探,约300名,每名宪补、宪兵补配给1名密探,约200名,共计密探数量约为500名。思想宪兵队本部设在新京(今吉林长春),队长由日本宪兵大佐或中佐担任,下设企划课、工作课、监察课、庶务课、财会课,课长由日本宪兵中佐或少佐担任。思想宪兵队下设7个分队,分别驻新京、奉天(今辽宁沈阳)、大连、锦州、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分队下设15个分遣队(不包括大连分队),分驻吉林、延吉、鞍山、佳木斯等东北各主要城市。<sup>①</sup>

关东宪兵队各分队、分遣队在进行思想对策活动中形成了大量的《思想对策月报》、《思想对策半月报》等各类报告,定期上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1940年前,侧重于分析抗日活动、共产主义宣传等内容;1940年以后则包括国外对满策动、共产党策动、反日思想策动、民族思想动向、治安事项、民心动向、社会现状等内容。

### 3. 建立殖民教育体系,实行奴化教育

在日本殖民统治的14年中,东北人民始终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日本侵略者清楚地知道,靠武力征服东北人民只是一种表象,“今日中国丧失土地大半,死伤国民百万,可抗日思想反日益巩固”<sup>②</sup>,而通过实施奴化教育,泯灭东北人民的爱国意志才是根本。灌输“中日亲善”、“王道乐土”等奴化思想,强行剥夺沦陷区人民学习本民族文化的权利,强制沦陷区人民学习日语,就是意图使沦陷区人民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隔断他们与中国文化的血脉联系,达到毁灭中华文化、泯灭中华民族意识、长期占领中国的险恶目的。因此,日本侵略者实施的奴化教育实际上是一场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的摧残式教育,重点在废除中国原有的教育体系,对教育内容进行肆意破坏。

(1) 从“王道”到“皇道”、“神道”的教育方针。日本殖民主义教育方针随着伪满政局的演变和政治统治的需要,经历了从“王道”、“皇道”到“神道”的演化过程。1932年4月1日,伪民政部颁布教育总则,明令“以王道为实施教育之方针”。日本关东军于1932年5月21日公布的《对满蒙方策(第四次方案)》中规定了在伪满实施奴化教育的基本方针:“必须彻底普及王道主义、民主协和的建国精神,和日满融合之观念,倾注日本文化……”<sup>③</sup>1933年7月9日召开的教育厅长会上,日伪阐明王道主义教育方针的目的,即“满洲国教育以重仁爱,讲礼仪,发扬王道精神……对世界民族讲亲仁善邻,共存共荣,达到大同为方针”<sup>④</sup>。日本侵略者标榜“王道”,不过是把溥仪包装成伪满洲国的皇帝,利用中国传统的儒家忠君思想来麻痹东北人民,接受其殖民统治。

为适应殖民主义统治深化的需求,1935年5月2日溥仪第一次访日归来,便颁布了《回銮训民诏书》:“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与友邦一德一心”,此后更是把“与日本一德一心”作为学校“建国精神”教育的中心内容。1937年公布的《学制要纲》更是自始至终无不强调“精神”二字,就是要使“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等思想完全为青少年所接受。教育方针进入“皇道主义”阶段。

“神道主义”的教育方针是在大东亚战争即将开始的新的政治形势下提出来的。1940年溥仪第二次访日归来,颁布了《国本奠定诏书》,确立“惟神之道”之国本,对教育方针进行了调整,规定:“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谕示之惟神之道……训育忠良之国

① 吉林省档案馆藏315号全宗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

② 转引自胡庆祝《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实行的奴化教育及危害》,《党史文苑》2010年第14期。

③ 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6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591页。

④ 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6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592页。

民……”<sup>①</sup>

日本殖民主义教育方针万变不离其宗，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要培养“顺民”，把中国人变成为其侵略服务的工具。

(2) 强制推行日语教育。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标志之一，是民族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元素。日本侵略者实施奴化教育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强制中国人学日语，淡化甚至消融中华民族的语言和思维习惯，接受日本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逐渐日本化，成为日本的“顺民”。馆藏 1942 年 11 月 13 日开拓局《关于朝鲜人开拓地普及国语（日语）之件》中一语道破普及日语的目的“要以普及国语运动的展开为契机，彻底进行皇民化运动。”并特别指出“要进行儿童的语言训练，通过儿童促进家族的国语普及”。

1937 年“新学制”实行后，日本侵略者颁布了《关于在学校教育上彻底普及日语之件》，从小学一年级就把日语当成“国语”，在东北各地开设日语课，并且大量增加课时量。除了学校里开展日语教育，各种推行、普及日语的机构如“日语讲习所”在社会上四处开花。1937 年，“所设日语讲习所总数约有 110 处，学习人员 9000 余名”<sup>②</sup>。

1936 年日伪当局在社会上实行日语、满语等语言等级检定考试制度，以推行日语的普及并以将合格者优先录用到各级机构任职作为激励机制。其目的是使“各民族浑然一体，使求肇国思想之民族协和，道义世界之实现，即所谓向创建王道国家之圣业上携手迈进，须先于各民族间得以圆滑疏通意思至为紧要”<sup>③</sup>。1936 年到 1940 年共进行了 5 次语学检定试验，共有日语合格者 10 154 人，满语合格者 3335 人，蒙古语合格者 43 人，俄语合格者 145 人。<sup>④</sup> 馆藏档案记载，伪满中央银行早在 1935 年就开始对行员进行“日语检定本试验”，从 1935 年 9 月到 1938 年 5 月，就有 6 次考试。“日语检定本试验”分为特等、一等、二等、三等 4 个等级，参加考试的人员需要通过“预备试验”，及格后才能参加“日语检定本试验”。1938 年 5 月 26 日伪满中央银行调查课《关于发表第六次日语检定预备试验及格者的通知》中记载了总行、奉天分行、安东支行、锦县支行等 13 个机构共计 339 人通过了“预备试验”，准许参加“日语检定本试验”。伪满中央银行专门下发文件，规定参加“日语检定本试验”的行员按出勤处理，并报销其相关费用。“对满人职员的日语检定测试合格者发放的奖金与日人职员相同”。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利用各种手段或强迫或诱使中国人学习日语。

(3) 篡改审定教材，摧残民族意识。伪满傀儡政权成立当天，溥仪就下令：“伪满洲国境内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不得使用中国教材。”<sup>⑤</sup> 日伪当局下达“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1931 年 10 月长春宪兵队在“市内 5 个中等学校搜出排日教材 50 余种、400 余件”<sup>⑥</sup>。1932 年伪满洲国民政部臧式毅训令吉林省长公署“严饬各教育机关贯彻建国精神取缔排外教材。”训令中写道“为令遵事。查我国肇造已届三月，各地学校主办人员之间，有尚未宣传建国精神，仍踏三民主义覆辙，滥用排外教材，甚至有揭扬青天白日旗侮辱国体情事，殊非纳民轨物之道，应由各省区长官暨特别市长转令主管教育官厅，严饬所属各市县教育局，今后务须贯彻政府建国宣言之精神，对于排外教材切实取缔，以一民志，勿得任意妄为、淆惑视听，致干未便。除分行外，合亟令仰遵照，切切此令。”<sup>⑦</sup>

馆藏 1943 年 2 月 27 日延吉宪兵队制定的《对发现的满洲国建国以前使用的小学校教材处理办

① 陈春萍、田丽梅《论伪满殖民文化统治特征》，载《大连近代史研究》第 4 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55 页。

② 胡庆祝《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奴化教育及罪恶举要》，《兰台世界》2011 年第 26 期。

③ 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 1 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330 页。

④ 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 1 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331 页。

⑤ 陈春萍、田丽梅《论伪满殖民文化统治特征》，载《大连近代史研究》第 4 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48 页。

⑥ 赵东晖、孙玉玲《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年，第 477 页。

⑦ 吉林省档案馆藏 171 号全宗档案。

法》中记载:2月15日琿春宪兵分队居民地查阅班于琿春县勇智村桦树屯27岁的李国仁家中卧室书架上,发现一本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高年级用《新时代地理教科书》(第4部),是李国仁上小学时使用的教科书。经宪兵队调查此书系“满洲建国后,由于国内教育改革,觉得上学时使用的书籍不可继续保管,于是将所有书籍烧毁,第二年十二月十日搬家时落下该教科书忘记烧毁,没有发现,将其杂乱地与杂志共同放置在一起”。宪兵队认为该书“内容上有借此进行抗日教育,对大东亚共荣圈的确立有阻碍之虞”,鉴于“李国仁本人在小学毕业后从事农业工作,在思想上无特别可担忧之处,妻子儿女都是文盲,思想端正”,在严加训诫之后将其放归。在1943年,这样一本伪满洲国建国前的课本,让延吉宪兵队大为紧张,并专门形成报告通报各宪兵队,可见伪满时期日伪当局对于排日教材如临大敌,要采取一切手段予以铲除。

在铲除原有教材的同时,日伪当局以“建国精神和国情”为基本方针,加紧编纂教科书。1934年9月1日,第一批“国定”教科书共22种36册正式发行,供各类中等学校采用。新教科书中满纸都是“王道乐土”、“日满亲善”,对历史、地理、中华文化等内容大肆篡改。例如,初中历史教材内容从辽金时代讲起,第一年讲满蒙史,第二年便讲日本史,妄图使中国青少年不知自己是炎黄子孙。由日方编著的历史课本更是黑白颠倒、美化侵略、美化殖民统治,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东北人民的重要载体。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明治、昭和时期的著名记者、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德富苏峰1940年出版的《满洲建国读本》,满纸讲的都是“王道政治”、“日满亲善”、“日满一心一德”等内容。

(4) 实施“新学制”并逐渐推广到关内。1933年,伪满政府颁布的《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写道“关于满洲国民的教化……把力量倾注于劳作教育,振兴实业教育。”根据这一要纲,1937年5月,伪满洲国公布了“新学制”。

“新学制”以伪满皇帝溥仪敕令的形式颁布,于1938年1月1日在中国东北正式实施。伪民生部的训令里说“新学制”的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sup>①</sup>。“新学制”缩短学习年限,规定国民小学4年制,国民优级学校2年制,国民高等学校4年制,大学3年制。从小学到大学从原来的16年缩短为13年。但是日伪当局很注重奴化教育从娃娃抓起,“王道立国,首重教育;教育之基,尤在童蒙”<sup>②</sup>,把培养“忠良之国民”的重点放在发展小学教育上。

新学制中,小学教育改头换面为国民小学和国民优级学校,维持6年制。为防止中学生民族意识、中国观念的萌生,对中学教育,新学制通过减校缩制、删改课程、改变学校性质、限制专业和升学比例及增加操练、劳作等,尽量减少知识传授。以前的普通中学一律改为职业性中学,分为农、工、商、水产、商船五类“实科”。在课程设置上,日语课被列为“国语”课,增加了日语课和劳动课的比重。小学历史、地理、自然等学科改造成“国民科”,后来又改为“建国建设”课。中学除开设“国民道德”课外,以“建国精神”课代替原来的地理课和历史课,强化殖民思想。取消了原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党义”课,代之以宣传封建道德的“修身”课。

大学教育也以“养成实用人才”为中心,但1938年5月成立的伪满建国大学是个例外。伪满建国大学学制6年,比新学制规定的大学3年学制增加了一倍,实际是为培养忠诚于日伪当局的高级“人才”。前3年开设“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和“作业训练”;后3年分为政治、经济、文教三大学科,同时必修“神道及皇道”、“武道及武术论”、“民族协和论”和“东亚联合及国际团体论”等课程。建国大学的学生一律公费,毕业后成为为日伪当局服务的“高等官”。

随着“新学制”的实施,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奴化教育体系搭建完成。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开始将伪满奴化教育的那一套向占领区推行。馆藏1943年8月7日《满洲评论》刊

<sup>①</sup> 郭小丽 《伪满时期赤峰地区殖民奴化教育之评析》,《赤峰学院学报》2011年第8期。

<sup>②</sup> 杨清林 《伪满时期的教育政策》,《辽宁法制报》2011年11月25日。

登山口滇一的《大陆教育建设论备忘录》中写道“鲤沼忍氏于昭和十八年（1943）末写的小册子《论北支政策中遗忘的文化工作与思想战开展之急务》引起我的兴趣，附录中所记载的‘北支政策中应迅速实现的文化工作及事业’，我认为应该作为参考。”鲤沼忍氏提到教育方面应迅速实现的工作为开设日语学校，清除排日教科书，出版、发布新定教科书和社会读本，结成青少年团体、学生联盟，开设小学、中学以及模范职业大学，开设图书馆（北京、天津）等15项。为推行奴化教育，派占领区人员到伪满洲国学习。档案记载，1939年晋北小学校教师组成满洲视察团到伪满洲国学习，伪满洲国外务局长官蔡运升专门下发《委托给晋北小学校教师满洲视察团提供方便》的文件，要求局里做好与相关方面的联系，做好服务，制定满洲视察团在新京的日程及对其进行导游等方面要求；关东军参谋长矶谷要求对其一行人尽量提供方便。

（5）推行“勤劳奉仕”教育，为侵略战争服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本侵略者在1942年以后开始推行“勤劳奉仕”教育（日语“奉仕”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服务、效力）。寺田隆良认为“国民勤劳奉公制度最核心的目的是‘振兴勤劳兴国精神，依据国民皆劳的根本观念，为国防国家的建设做出贡献，为重要产业方面所需要的劳力集结努力，同时通过勤劳对国民进行训练，让其完成兵役任务的同时建设国民组织的核心’。勤奉制的特征是动员青年国民有组织性地为国家贡献……唤醒青年内心深处潜在的正义感，激起国民的自觉性，将青年的热情与对国家和乡村的爱集结起来。”<sup>①</sup>1942年10月26日，日本侵略者先后公布了《国民勤劳奉公局官制》、《国民勤劳奉公法》、《勤劳奉公编成令》等法令，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公民特别是学生必须要参加这种明显带有掠夺劳动力性质的劳动。

“勤劳奉仕”教育是伴随着日本侵略者“南进”政策而产生的，完全是为扩大侵略战争服务的一种手段。这种制度使劳动占据了学生的大部分时间，从而减少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降低了教育水平和学生的素质。1945年2月，伪满洲医科大学勤劳科学研究会医学博士牧野武专门对勤劳报国挺身队员的精神医学状况进行调查，并形成报告，报告指出“将学徒就劳作为一个廉价的代用劳动力”<sup>②</sup>。

#### 4. 移植日本宗教，控制民众信仰

神道教是日本本土生长的宗教，是日本文化的象征。1889年，日本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神道的宗教统治地位。1905年日俄战争后，主要供奉天照大神的神社来到东北，成为神道教布教的场所。1905年在安东（今辽宁丹东）建立了中国东北第一个神社，1913年在长春建立神社。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7年以后日本神社数量急剧增加，成为奴化东北人民的工具。日本在东北建立的标志性神社当属“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将“日满宗教必须一致”确定为伪满洲国的国策。吉林省档案馆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全宗保存的《关于创建建国神庙的反响以及内查之件的报告“通牒”》中指出“有人认为这次以天照大神建立建国神庙，是统一连接日满支‘通道’——信仰、思想最适合的方法，可以说把世界文化还原为东洋文化。”《大同报》的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建国神庙的创建是日本对满政策百年计划的表现。”<sup>③</sup>

在日本统治当局的积极策划下，1940年6月溥仪第二次访日，亲自将日本“天照大神”的3件“神器”，即象征着仁、智、勇的八咫琼曲玉、八咫镜、草薙剑迎回东北，作为伪满洲国的“建国元神”，供奉在建国神庙内。在伪满洲国颁布的《国民训》中，第一条就是“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至崇敬于天照大神”。7月15日，日伪以国祭规格确立“天照大神”为伪满“建国元神”。伪民生部以部令通告，正式将日本的“开国元神”奉为伪满的“建国元神”。同日，溥仪又颁布了由日本人起

<sup>①</sup> 寺田隆良《勤奉制度的战时意义与部队运营》，载《满洲评论》第26卷，1944年，吉林省档案馆藏。

<sup>②</sup> 吉林省档案馆藏315号全宗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

<sup>③</sup> 吉林省档案馆藏315号全宗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

草的定天照大神为祖宗和国教的《国本奠定诏书》和《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庙祭祀令》。同时，设立祭祀府，总裁由原关东军参谋长、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桥本虎之助担任。《国本奠定诏书》中说，伪满之所以要供奉天照大神，建立建国神庙，是为了“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并称伪满“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所以要“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禱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万世祇承，有孚无穷”，特别强调“国本奠于惟神之道”。<sup>①</sup>

建国神庙创建以后，关东宪兵队要求各地宪兵队调查伪满各界对此事的反响。1940年7月20日，新京宪兵队长近藤新八在《关于创建建国神庙的反响以及内查之件的报告“通牒”》中指出：“建国神庙的创立，将会给一般官民，特别是满洲人智慧阶层带来相当深远的影响”，“建国神庙的创建是八纮一字大精神的表现，能够达成对日满一德一心的认识和信仰”。调查认为“很难使一般民众彻底理解。随着神庙的创建，有一部分满人的心理属于屈从征服者的权势的被征服者的心理。还有一部分人完全无法理解，认为这侵犯了满洲国的神域，助长了傀儡国家的观念。”<sup>②</sup>

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竹内宽综合各地的调查结果，向关东军司令部进行了报告，指出“满人方面现如今有所认识的人还少，知识分子阶层的多数人为了迎合表达赞意，但是一部分有识之士表示，这样的祭祀是日满民族的根本性问题，应该重视，并且表示由于让普通民众对此彻底理解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进行什么样的宣传能让日满两民族在精神上达到永久的融合，这让人担忧。”提出意见：“对于神庙建立宗旨的贯彻需要大量的宣传和普及。同时需要对反对建国神庙的宗教各团体以及有所言行的人给予严厉的监视。”<sup>③</sup>

日伪当局在伪满各地修建神社、神庙，强迫东北民众信奉“天照大神”，不分教派宣扬“日满一体、不可分离”的“惟神之道”的“建国精神”。据统计，到1945年，东北沦陷区内的大小日本神社多达295座。<sup>④</sup>伪满政府效仿日本的靖国神社，在东北各地修建远比“神社”更具有强烈的日本殖民奴化特征的“忠灵庙”。伪满建国忠灵庙每年固定的祭祀活动多达20次，到伪满灭亡之前合祀“为满洲建国而战死”的日伪亡灵共40850人。<sup>⑤</sup>日伪还采取强制性手段迫使东北人民祭拜所谓的“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1940年7月15日发布的《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不敬罪处罚法》规定“对于建国神庙有不敬行为者，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建国神庙之摄庙有不敬行为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还规定“本法无论任何人，对于在帝国领域外犯本法之罪者，亦适用之”。<sup>⑥</sup>该法施用范围之广，用心之毒，施行之专横霸道可见一斑。

伪满建国神庙及伪满建国忠灵庙的建立、“惟神之道”的实行，使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民族奴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在思想上确立“日满一体”的殖民统治体系，企图消灭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将中国东北从文化渊源上纳入日本文化之中，使民众只知有满洲而不知有中国，只知日本文化而不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日伪当局还利用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作为文化侵略的工具，并在伪满洲国进行宗教倾向调查。1939年完成第一期调查。从1940年开始，又制定了3年计划，继续进行宗教派别的调查。<sup>⑦</sup>据1937年伪满洲国民生部社会司编印的《宗教调查报告》和1944年满洲情报处编印的《满洲的宗教》，调查范围涵盖东北全境，甚至包括一些十分偏僻的地区。调查内容包括东北所有教派团体的名称、规

①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95页。

② 吉林省档案馆藏315号全宗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

③ 吉林省档案馆藏315号全宗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

④ 陈春萍、田丽梅《论伪满殖民文化统治特征》，载《大连近代史研究》第7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2页。

⑤ 沈燕《伪满遗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16页。

⑥ 转引自李茂杰、孙继英《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中，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359页。

⑦ 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分论上，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长春：内部发行，1990年，第733页。

模、性质、习惯、布教场所、信徒人数、政治倾向等。在调查后的对策中提出，“传教者作为宣传师首选说明满洲建国精神”，“要使很多有教养、有虔诚信仰的宣传师归顺我们的建国理想并参与进来”；强迫基督教、天主教等信徒参拜靖国神社。馆藏档案记载，通化宪兵队、哈尔滨宪兵队对不参拜靖国神社的教徒进行密切监视和控制；严厉打击宣传抗日思想的各教信徒。馆藏档案记载，安东普济佛教信徒因宣传排日、反满思想被秘密逮捕。

#### 5. 严控报刊出版，输入日本出版物

关东军控制下的弘报处对东北新闻报业的控制是通过伪满“弘报协会”进行的。1936年1月9日，新京宪兵队长马场龟格在给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的《对满洲弘报协会关于新京满铁青年职员动向的报告》中，就有“弘报协会的相关人员根据军部的意图不断召开会议”的话语。<sup>①</sup>

1935年10月，伪满政府决定将整顿后的报社、通信社、出版社等13家单位联合成立弘报协会。经过近一年的筹办，最后由“满洲国政府”、“满铁”和“满洲电报”三家共同出资，设立了“特殊株式会社”性质的伪满洲弘报协会。伪满洲国一些主要报社都成为弘报协会的会员。据馆藏档案记载，1936年，《英文满报》、《大新京日报》、《大同报》、《奉天日日新闻》、《盛京时报》、《大北新闻》、“满洲国通信社”、《哈尔滨日日新闻》、《哈尔滨スコエウレミヤ》、“斯民社”、《满蒙日报》、“满洲事情案内所”、《满洲日日新闻》等都是弘报协会的会员。其中行销东北的头号大报《盛京时报》是1906年在沈阳创办的，《大同报》是设在长春的伪满政府机关报；日文报纸《满洲日日新闻》是由“满铁”出资创办的，《哈尔滨日日新闻》是伪满北部地区最有影响的日文报纸。馆藏档案记载，1936年弘报协会的维持费用共计1000日元，按各个新闻社50人、每人20日元进行分配。

1937年，日伪当局为全面侵华战争作舆论准备，加强弘报协会对新闻舆论的统治，对报业重新进行了整顿：淘汰了一批弱小报纸，坚决取缔有进步倾向的报刊，四大城市——奉天、大连、新京、哈尔滨只保留弘报协会控制之下的成员报纸中日文各一种，其他地方实行一地一报。经过整顿，90%的伪满报纸为弘报协会所控制。

1940年，弘报协会解散，设立伪满新闻协会，但是对新闻通讯实行统制、操纵的职能没有变。为了麻痹民众，当时所有报纸都要宣传日本侵华战争的“合理性”，美化侵略战争为“解放东北、解放中国、解放东亚”。1942年1月，“满洲国通社”、康德新闻社、“满洲日日新闻社”（日文）、“满洲新闻社”（日文）等新闻通讯机构全部改组，报纸改为官办，建立通讯新闻新体制，伪满政府实现了对新闻报道机关的完全控制。

在出版方面，取缔具有民族意识和反满抗日思想的书刊。仅在1932年3月至7月间，日伪当局查禁、焚烧书籍达650余万册，<sup>②</sup>其中包括很多自然科学书籍。1941年11月，对《出版法》进行修改，大量进口日文书刊、中文出版物严受统制，只有宣传日本侵略战争和诋毁中国民族文化内容的书刊才能出版，同时严禁反满抗日的出版物和关内抗日报刊输入东北。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年到1938年间，日本国内宣扬军事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东北。1936年，日本向伪满出口书籍58.7万册，1937年增至380万册，1940年达2230万册，1941年高达3440万册。1939年，伪满进口日本报纸5494万余份、杂志827万册、书籍1440万余册。这个数字是当年中国关内进入东北报纸数的10倍、杂志数的487倍、书籍数的14倍。伪满时期，平均每天有15万余份日本报纸、2.2万余份日本杂志、4.9万余册日本书籍涌入东北。<sup>③</sup>日本侵略者妄图借巨量日本出版物的输入，向东北人民强制灌输法西斯殖民文化。

① 吉林省档案馆藏315号全宗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

② 陈春萍、田丽梅《论伪满殖民文化统治特征》，载《大连近代史研究》第4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9页。

③ 姜念东《伪满洲国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6页。

#### 6. 利用傀儡皇帝的影响力麻痹民众思想

日本侵略者利用末代皇帝溥仪在普通民众心中的影响力,以达到思想统治的目的。溥仪的照片被称为“御容”,标准像叫“御真影”,到处张贴,任何人经过溥仪的照片必须鞠躬行礼。伪满各地的军队与学校在每天早晨举行的朝会上,要先向东京日本天皇的“皇居”方向遥拜,再向长春溥仪居住的“帝宫”方向行礼。学生每天都要用日语背诵《国民训》,读《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等内容,唱“国歌”,从思想上归顺日伪统治,不把自己当成中国人。

日伪当局在宣传溥仪的诏书方面也不遗余力。据馆藏《第一次吉林省教育局长会议记录》记载,此次会议的主题为“向国民彻底地普及诏书圣旨的方法是什么?”参加会议的吉林、永吉、额穆(今蛟河)、双阳、长春县教育局长谈了他们的做法。根据档案记载,长春县教育局拿出了非常系统的普及方法,分为教育和一般两方面。教育方面采取四种方法:第一,奉诵诏书,学校的开学日和结课日以及纪念日奉读诏书;第二,编入教科书,向文教省申请,将圣旨的要旨编入教科书,以此让学生更彻底地了解圣旨,了解日满共存共荣;第三,以诏书为基础制作训育方针,训练学生;第四,派遣留学生,吸收日本文化,养成日满亲善的思想。在一般方面提出:第一,诏书圣旨的演讲。各教育馆向民众演讲有关诏书的大意、伪满建国以来日满亲善合作等事实,以及前次皇帝陛下访日的事项方面的内容;纪念日,县公署组织宣传班在各村社进行巡回演讲,制作关于诏书意义的宣传单、宣传册发放给民众;携带皇帝陛下访日的影片,去各地巡回放映;第二,普及日语,体会纯正的日满一体,实践诏书圣旨;第三,要普及尊孔观念,读经,学习日本的忠臣爱国的“美德”;第四,应该组织政治视察团或是教育产业视察团去日本,实地对日本的政治、教育产业进行视察;第五,经济合作,要本着日满一体的精神,倡导经济合作,借助友邦日本的力量开发利用为人类做贡献。长春县教育局指出“以上各项若是彻底施行,日满必然能实现一体,王道乐土、东亚和平也能实现”。永吉县还提出,“把诏书圣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或者是转换成歌曲、制作成小册子等方法向民众宣传”,“让学生们根据诏书制作宣传标语和绘画,并对优良者实施奖励,或者将其作品予以公示”,“如果有诏书圣旨奉行着,要对其美行加以赞赏”,“在体现日满关系问题的场合,尽可能地以诏书中所体现的圣旨来证明”等方法。

#### 7. 设立“满映”,美化侵略行径

电影作为易于被大众接受的传播媒介,是一种喜闻乐见的宣传工具。为了从思想上进行殖民统治和文化渗透,更直观、形象地传播“建国精神”,1937年统制伪满电影事业的特殊国策会社——“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以下简称“满映”)在长春创立。“满映”的成立垄断了伪满电影的制作、输出、输入和上映,使其成为日本侵略者对东北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有力武器。“满映”的一份文件指出“满洲映画协会是满洲国的国策会社,根据日满一德一心的正义,本着东亚和平思想的真精神,在平常无事的时候,对于满洲国的精神建国,具有重大的责任,对于日本和中国等国家,应当将满洲国的实在情形,充分介绍,使他们十分的认识,而且对于其他满洲国内一般文化的向上贡献材料。到了一旦有事的时候呢?它的责任就更大了,就是与日本达成一气,借着电影这个东西,实行对内对外的思想战、宣传战!”<sup>①</sup>“满映”生产三类影片,即启民影片、娱民影片、时事影片,也就是纪录片和教育片、故事片、新闻片。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满映”共拍摄了108部故事片、200多部纪录片和新闻片,翻译发行了数百部外国影片。

“满映”作为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的宣传机器,其拍摄的影片体现了国策电影的思想。无论是宣扬伪满洲国“新貌”、日满和谐假象的启民电影,还是宣扬日军“勇敢精神”、炫耀日本关东军对东北侵略的娱民电影,都是在美化战争、灌输殖民主义思想和文化。吉林市档案馆保存的伪满军官施明儒在1942年6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舰上带的宣抚电影,今晚在街内工会堂上演。人们都管它——

<sup>①</sup> 转引自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3页。

《白兰之歌》叫协和片，不错！人言里夹杂着鬼语，非驴非马的东西。”

“满映”还大量输入日本电影，1936年进口日本影片154部，1939年则输入1630部。<sup>①</sup>

#### 8. 迫害爱国抗日文化人士，阻断文化启蒙

伪满时期，爱国抗日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就是文化人士的斗争，通过创办抗日刊物、组织爱国文艺团体、创作爱国作品等形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日伪当局不断地围剿、镇压和迫害中国东北爱国抗日文化人士，以1935年罗峰被捕为前奏，经过《黑龙江民报》社事件、哈尔滨口琴社事件、安东教育事件，到《文艺指导纲要》出笼后的1941年底“一二三〇”事件达到高峰。

“安东教育事件”的起因是日寇为了强化其反动统治，对具有爱国反满抗日思想的教育界、知识界的一次血腥大镇压。从1936年11月12日到1937年1月7日，日寇以“肃清东边道救国会”为名，以安东宪兵队为首，在安东、凤城、岫岩、宽甸、庄河、桓仁、通化、临江、长白等县，大肆搜捕，省、县教育厅（局）长、会长、中小学校长、教务主任等及部分商界、财界人士达300余人。<sup>②</sup>

日伪当局对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倾向的进步作家进行严密监控和严酷迫害，萧军、萧红、穆木天等大批作家被迫先后离开东北。1941年上半年，日伪政府颁布了《文艺指导纲要》，进一步强化思想文化统治。1941年12月30日，日本特务机关制造了“左翼文学事件”，又称“一二三〇”事件。关沫南、李季风等作家被捕，惨遭严刑拷打。

“一二三〇”事件后，关东宪兵队认为东北左翼文学运动虽受打击，但是“运动方法更为巧妙”。关东宪兵队根据对李季风的审讯记录，对东北左翼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专门资料分发下去。在《满系左翼文化运动档案》中，对左翼文学的沿革，东北左翼文学的形成、派别、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关东宪兵队将1942年中国东北的左翼作家分为三个派别：山丁派，以梁梦庚（山丁）为代表，继承历史传统，宣传社会主义的艺术至上主义，作品描写满洲人的悲惨生活，站在大众的立场上说明社会主义，读者群为激进的文学青年学生；古丁派，以徐长吉（古丁）为代表，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宣传社会主义的文化主义，根据文化的取材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暗示社会主义思想，读者为不满社会现实的知识青年学生；李季风派，以李季风为代表，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吸收外来“敌性”文化，宣传社会主义，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启蒙大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读者为激进的文学青年、文化主义青年学生、关心政治的中青年等。“在满洲的左翼文学，是数派鼎力并行的。不仅根除困难，而且今后随着人民程度的提高，将有多发之虞，因此要注意”。<sup>③</sup>

#### 9. 毁坏中国历史文化遗址，劫夺稀世文物和珍贵图书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无视国际法关于战争过程中对人类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规定，毁坏中国文化遗产，抢掠中国文物与图书，造成中国文化遗产的极大损失。

首先，对中国东北古遗址进行大规模盗掘。1933年，由原田淑人、池内宏等率领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盗掘了渤海上海京龙泉府遗址（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东京城），盗走文物23箱；1935年，由池内宏、滨田耕作率领的发掘队盗掘了吉林省集安高句丽古墓，劫走了大批古文物；1935年，由滨田耕作率领的发掘队盗掘了赤峰红山后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将出土的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1000余件运回日本；1937年，鸟山喜一、驹井和爱等对吉林延吉、珲春等地的渤海遗址进行了破坏性的发掘；1941年，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发掘了吉林省四平山积石冢，将出土的玉牙璧、玉斧、玉锛、玉锥形器、蛋壳黑陶把杯、黑陶双

①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12页。

② 《安东教育事件大惨案》，<http://www.donggang.gov.cn/mshhtml/2006-4/15027.html>。

③ 吉林省档案馆藏315号全宗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

耳盂等精品运回日本。<sup>①</sup>

劫夺文物图书是日本文化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便制定各种方策,有计划地抢掠中国学术研究资料中的非卖品刊行物,截至1936年,共抢夺中国非卖品刊行物7479件,21395册。<sup>②</sup>据有关专家统计,1930年至1945年8月,中国的文献、文物遭到空前洗劫。其中劫往日本的中国文献典籍计有2万余种,合20余万册,另有209箱,所装书籍不详;中国历代字画计1万余幅,另有16箱所装字画不详;中国历代碑帖近万件;中国历代文物计有2万余件,另有2箱不知其数;中国历代地图计有5万余幅。<sup>③</sup>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毁坏中华文化遗址、劫掠中国文物及图书,就是要毁我中华文化,灭我中华民族。

## 结 语

军事侵略是血腥的屠刀,思想文化侵略则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历来的殖民者都将武力侵略与精神统治结合在一起,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深谙此道。日本历史学者德富苏峰在1940年出版的《满洲建国读本》中就曾狂妄地宣称,“以大和民族的优秀的国民性和它的文化作为中心,结合土著民族固有的文化,建设新的大陆文化”。“欲灭其人之国,须先灭其文化”。在中国东北沦陷的14年中,日本殖民者充分发挥了思想文化的统治作用,将之纳入战时的侵略体制,成为侵华战争的掩饰、补充和协力。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9年了,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深重罪恶则是无法抹灭的。立足当前,分析日本对东北的思想文化侵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 思想文化侵略贯穿于日本侵华战争始终

纵观日本侵华国策理论的形成过程,从18世纪最初的个人侵华思想到侵华国策的全面形成和最终实施,日本一直在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对华思想文化侵略理论。这套理论按部就班地被实施于每一个侵略步骤。这充分表现了日本文化深层所包含的扩张梦想之狂妄、侵华战略之细致、发展历程之漫长等特点。他们的侵华理念先是被理论化,而后为广大日本民众所接受并形成思想舆论,继而影响政府决策,促使其不断寻找机会走上现实的侵略扩张之路。

### 2. 思想文化侵略是日本实施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

为了达到永久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日本在思想文化侵略方面下足了工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基于长久占领之目的,大肆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事业和科学文化事业,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中国历史文化遗址和稀世文物进行掠夺和盗掘,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屠杀”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事业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以中国东北为例,从吉林省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档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和疯狂的经济掠夺,另一方面强制推行日本法西斯殖民奴化教育,肆无忌惮地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有目的地从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改变中国东北人民的思想。日本侵略者配合“防共”、“反苏”、“民族协和”的欺骗宣传,以掩盖其进行殖民统治的野心,把侵略战争说成“圣战”,把参拜神社说成“爱国心和忠诚的体现”,宣传天皇至上和“殉国”的宗教精神。同时,日本侵略者大肆迫害爱国抗日文化人士;成立伪满协和会等机构,招揽特务、汉奸为其服务。

### 3. 当前日本右翼言论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侵略的现实表现

<sup>①</sup> 上述数字转引自李娜《满铁对中国东北古遗址的盗掘及文物掠夺》,《东北史地》2011年第3期。

<sup>②</sup> 满铁总裁室、地方部残务整理委员会:《(极秘)满铁附属地沿革全史》(1939年9月),第735页,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藏。

<sup>③</sup> 蒋伟国《侵华日军祸书录》,《民国档案》1997年第3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依靠经济发展逐渐提升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世界影响力。但近年来，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日本在国际社会上依靠经济发展谋求大国地位的愿望屡屡遇挫。一些日本政要及团体便转而希望依靠政治和军事力量，提升日本的国际形象和国内的民众支持率。偃旗息鼓的日本右翼势力在近十多年呈现抬头趋势，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和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所谓“鹰派”表现尤为突出。从参拜靖国神社，到解禁集体防卫权；从抛出“侵略未定论”，到声称对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进行所谓背景调查；从渲染“中国威胁”，到妄图侵占钓鱼岛……种种倒行逆施的行径，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一笔勾销。日本右翼势力否定的是历史真相，冲击的是国际秩序，挑战的是公理正义。

日本右翼势力之所以敢公然为军国主义招魂，就在于颠倒黑白、否认侵略在日本一直是一股成体系的势力。上至国家首相，下至地方议员，总有日本政治家参与甚至主导掩盖罪恶暴行、篡改战争性质的倒行逆施行为。这种战后为日本侵略罪行“漂白”的行径，是日本现时对中国进行的文化思想侵略。可以说，“打破战后政治体制”的日本与战前的军国主义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日本右翼分子的种种手段，尤其是打出的种种口号，都和历史上的日本军国主义如出一辙，相互呼应，这说明日本右翼势力的谎言谬论与历史上日本对华思想文化侵略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必须采取果断行动，用事实说话，揭露其罪行，对日本右翼势力的错误言论予以有力反击。

战争创痕仍犹在，警钟长鸣鉴今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所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就此而言，反击日本右翼言论思想，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不仅是在捍卫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更是在维护世界的文明与正义。

责任编辑：刘 莉